

21世纪学术文库

陈晓明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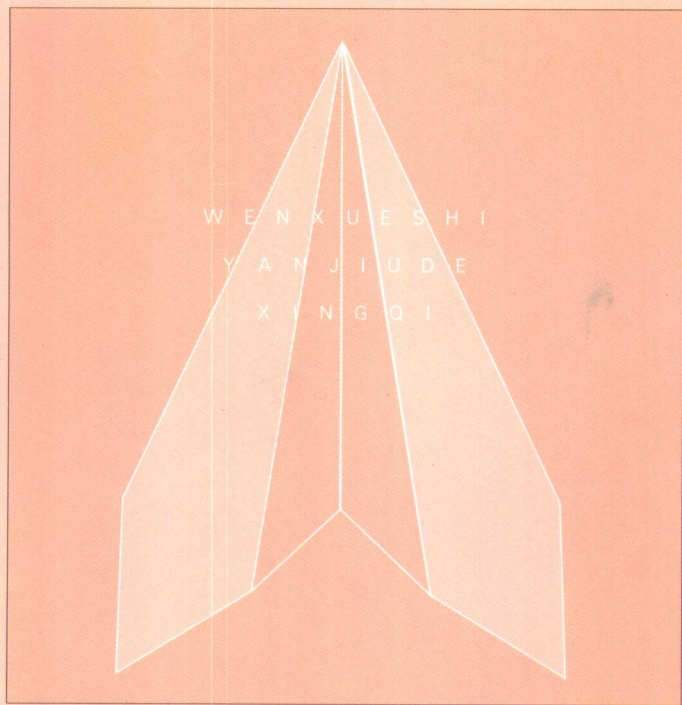
# 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WENXUESHIYANJIUDE  
XINGQI

程光炜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透过文学史和知识考古学的视野  
呈现文学史写作及研究的现时问题  
解剖文学思潮与现时代性、文学杂志与现时代都市等问题



# 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曹文轩 著



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曹文轩 著

## 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史研究的兴起/程光炜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9

(21 世纪学术文库)  
ISBN 978-7-5334-5074-8

I. 文… II. 程… III. 文学史—文学研究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3159 号

21 世纪学术文库

**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程光炜 著

\*

主 编: 陈晓明

策划编辑: 黄 旭 陈玉龙

责任编辑: 陈玉龙

特约编辑: 危砖黄

---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33693 83706771

传真: 83726980 [http: //www. fep. com. cn](http://www.fep.com.cn))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 350012)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5 字数 352 千 2 插页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ISBN 978-7-5334-5074-8 定价: 38.00 元

---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 目录

## 上编 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图式

|      |                                           |       |
|------|-------------------------------------------|-------|
| 第一章  | 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分歧和建构 .....                     | (3)   |
| 第二章  | 文学叙事的权力 .....                             | (17)  |
| 第三章  | 文学史:作为一种知识和控制 .....                       | (43)  |
| 第四章  | 文化研究与现当代文学 .....                          | (56)  |
| 第五章  | 左翼文学思潮与现代性 .....                          | (70)  |
| 第六章  | 20 世纪 40 年代:文学杂志与现代都市 .....               | (86)  |
| 第七章  | 试论 20 世纪 40 年代的文学环境 .....                 | (122) |
| 第八章  | 20 世纪 40 年代文学与文人集团 .....                  | (149) |
| 第九章  | 从《文艺报》一个栏目看 20 世纪 50 年代文学的问题 ...<br>..... | (169) |
| 第十章  | “新时期文学”的学术定位问题 .....                      | (182) |
| 第十一章 | 历史叙述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主流文学” .....             | (196) |
| 第十二章 | 什么是“新世纪文学” .....                          | (220) |

## 下编 历史·文本·文学

|       |                         |       |
|-------|-------------------------|-------|
| 第十三章  | 略谈清末新知识界的社会角色·····      | (235) |
| 第十四章  | 中韩两国文学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身份转换····· | (241) |
| 第十五章  | 当代史与主体文学形象的兴衰·····      | (255) |
| 第十六章  | 历史文献的解读问题·····          | (270) |
| 第十七章  | 20世纪60年代的电影文化·····      | (287) |
| 第十八章  | 战争文化与审美意识·····          | (302) |
| 第十九章  | 周扬与当代文学·····            | (319) |
| 第二十章  | 长篇小说“三红”的写作策略·····      | (335) |
| 第二十一章 | 王安忆与文学史·····            | (351) |
| 第二十二章 | 莫言与文学批评·····            | (369) |

# 上 编

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图式



## 第一章 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 分歧和建构

毋庸讳言，在目前中文系七个基础学科中，“当代文学”的学科可靠性一直让人疑惑和担心（类似情况，恐怕还有文艺学、比较文学

如，对“批评”、“研究”价值估定的分歧，是不停地跟踪现象，还是停下来做一些情理和切实的研究，以及设定边界、积累资料进而形成话语共识，等等，这都使问题无法获得进展。

始终没有将自身和研究对象“历史化”，是困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我国现代学术史上，所谓“学问”之建立，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就是一个学科、一个学者有没有一个（或一些）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而这个（这些）研究能否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存在，并拥有足够清楚、自律和坚固的历史逻辑，等于是是否可以作为“学问”来看待的一个基本根据。1978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记得系里治古代文学、古汉语的教授是最“吃香”的，不仅名牌教授云集，而且声誉极高，被认为是中文系最有“学问”的关键性学科。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大学中都很普遍。在当时，“现代文学”就如今天的“当代文学”一样“跛脚”，教授布不成阵，而且颇受“二古”的歧视与奚落。经过二十多年和几代人的努力，这种“落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某种程度上，目前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他们的自我感觉，似乎已经和当年的“二古”学科一样的“良好”了。其诸多原因，容我不再展开讨论。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认的，即由于它对自身及其研究对象持之以恒所开展的“历史化”的工作，足以被人看作是一门可以称道的“学问”。这种历史化，既有时间范畴上的，如“五四文学”、“三十年代文学”、“四十年代文学”；也有地域上的，如“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东北沦陷区文学”；又有流派上的，如“京派”、“海派”、“自传体抒情小说”、“乡土小说”、“为人生文学”等；另外还有作家作品研究，如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钱钟书、张爱玲等专属领域，为此，成立了名目繁多的“研究会”（如“鲁研会”、“郭研会”、

“曹研会”)，还形成不同的“研究界”和“研究圈子”。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凡“知名”学者，谁都知道他是“研究什么”的。而在当代文学界，提到学者名字，皆可称为“搞当代文学的”，或都是“著名批评家”。这样的“称呼”，自然让人感到不甚舒服，但实在也道出了当代文学一直缺乏学科自律、没有历史规划，因此带有相当的学科随意性的尴尬现状。我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我自己的某些工作，同样也不例外）。

当然，上述“缺失”，近年来已有所改观。在当代文学中，已经出现了一批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有了基本的“历史眼光”和“研究方法”，同时，也开始形成一些比较固定的研究“范畴”，如“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80年代文学”等。但是，在人数众多的当代文学界，“当代文学研究”的声音依然是非常微弱、寂寞的。究其原因，一是历史习惯的问题。大家都没有将它当作一个“历史”学科看，所以，不认为“潜下心来”，就应该是当代文学的所为。在有些人眼里，“潜心研究”还可能被看作是“不敏感”、“没才气”的表现。而在当代文学中，“才气”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从业素质，这就使一些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出名，但是可能中年之后，随着敏锐度下降，精力日益不济，一些人便不得不渐渐退出竞争，变得无事可做，或以文学活动为主，当然也有例外（在当代文学中，知识结构的新旧与否是很重要的；它在其他学科虽然也有必要，但“功夫”的深浅却往往更受重视）。这种情况，与许多“传统”学科有很大的区别。“传统”学科因为属于“历史”学科，不少人虽出名较晚，但在中年、老年阶段反而日见“炉火纯青”，他们“最好”的著作，不少是在这一人生阶段完成的。二是偏重潜意识中追求“轰动效应”，把当代文学等同于“提出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方式，这也不能说在研究者中没有较大的市场。当然，当代文学的一部分学科性质，就在于它比其他学科更重视“前瞻性”和“前沿话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果在学科中占有“压倒”趋势，甚或成为一哄而起的抉择时，那么问题也会随之而来。如“问题”的表面化、话题化和泡沫化，缺乏深潜的研究和继续追问的实际效果。它还势必会导致心态的

悬浮，使人们的批评观点经常处于一种朝见夕变、疑惑时起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有稳定可靠、根据十足的成果问世。这也是我们必须警惕的。第三，仍然把对不断涌现的纷繁文学现象的“宏观式”跟踪和描述，看作当代文学的“主流”方向。自然，作为文学发展的某些标志性东西，“现象”、“潮流”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有时候，它还会成为认识一个时期文学“根本规律”的敏感的试金石。不过，面对大量的宏观式眼光和论文，这种“现象批评”也存在一些需要质疑之处。

在我的视野中，所谓“现象”，一般是有“当前”和“历史”的区别的。不过，即使如此，“当前”现象中仍然含有“历史”的因子，不是一种从天而降的产物。而且在现象内核之中，还潜藏着多层交叉、重叠的含义，有不少性质不同的问题需要加以辨析才能看得清楚。但是，在诸多“现象批评”中，有些项目由于被认为是一项被批评家个人“发现”的最新成果，让人产生急于攻占的欲望，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重要性就势必降低，为“当前”所取代，甚至有可能完全被遮蔽。如在“新世纪文学”的讨论中，这种现象就比较普遍。在一些批评家的文章中，“新世纪文学”被认为是“全球化”、“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一手包装的东西，他们也许没想到，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在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左翼文学”等等，是可以同样的话语形态、批评方式称之为“新世纪文学”的。至少在学理上，这种联想大概不会犯错。又如新近“很热门”的“民间写作”的现象描述，在不同的批评家那里，至少包括了这几层意思：一是指它与“国家话语”相对立、冲突的异质姿态和内容。另一指作家通过对“民间文学资源”的吸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非常鲜活的“个人化”写作状态。还有人认为，如果缺乏个人创作才能，那么对作家来说，“民间”就很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异化的因素。这样一些表述，使得这个概念变得非常的饶舌费解。造成概念、角度上的混乱，显然与缺乏“历史”的分析有关。另外，也不排除急于建立某一理论、方法的优势，争夺某些话语权的心理。这种可以理解的混乱，实际反映出当代文学一直缺少“学术规范”的问题。即便有再多

现象跟踪、描述、总结，如果没有建立在对这些现象的材料占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而是拿出来就写，用一种理论事先预设，得出结论的可靠性就不免令人生疑；如果连作品都未读完，就连声说好，并不着边际地给出吓人的定论，这样的做法难道就很妥当？又如果，提出一个问题，总得对基本概念做点限定，划出讨论范围，并指出它本身的某种限度，否则那只叫虚张声势，无助于问题的求证、分析和展开。在我看来，所谓的“历史分析”，就是在占有材料，充分理解现象背后所潜藏的各种问题的纠缠、矛盾和歧义之后，然后针对这些现象所作出的谨慎、稳妥和力求准确的论述。当然，当代文学“每天”都在发生，面对大量、鲜活且不重复的诸多“现象”，批评者怎能耐下心来冷静研究？要他足不出户，不出席各种座谈会，而日日那样坐在书斋翻阅材料、清理思路和字字掂量也不现实……这是我们实际的困难，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 二

当代文学学科的另一问题，是如何看待“批评”。在一些人看来，批评是最能显示文学的“当代”特征的一种书写形式，它的敏锐性、针对性是一般的研究无法相比的。这种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近年来，批评也招致了一些这样的抱怨，如“表扬批评”、“圈子批评”、“炒作”，如“以偏概全”、“才子气横溢”等等。后者指责的是，对文本不尊重、没有标尺的赞扬，或者那种既缺乏起码根据，也根本不与批评对象进行“对话”，而是自说自话的否定。例如有的“美女作家”写得并不怎样，却被封为“罕见奇才”，而有的知名作家偶失水准，或有点“商业”考虑，即被批得“体无完肤”，一钱不值。根据我有限、粗浅的阅读，有一部长篇小说一直没有使我感到兴奋、沉迷，但在一些批评文章中，却获得了“很高”的评价，也令人不能理解，如此等等。这里，可能涉及一个问题，即“批评”究竟有没有一

个众所周知的“标准”？一方面，批评家对文本的兴趣，已经不限于“文本”，他本人就生活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每天都必须面对金钱、声誉、媒体、观众。也就是说，“文本”已经超出了文学范畴，而变成了这个“世界”，那么，你怎么叫他只对“文本”负责，而不对整个“世界”负责。另一方面，批评还能不能回到“文学”当中。这里所说的文学，一般是指文体、叙事方式、象征、隐喻、文本独创性、作者、读者、作家的才能等等。而在有的批评中，所讨论的却是知识分子、历史、性别、种族、妇女、地域文化这些文化批评话题，“文学”只作为某个故事片断或人物活动，成为证实、支持上述“知识”的鲜活个例。在这里，“文学”变成了“知识”的附庸，成为显示真理、话题的辅助性的一堆材料。但是，对于上述指责，批评家也有他们的理由。在他们看来，对任何文学文本，批评者都有权利作出自己的选择。作为批评“主体性”的显示之一，批评不应该成为作家、文本的附庸，不应该被人左右思想的发挥。在充分显示批评家“个性”的前提下，作家和文本，不过是其展示眼光、观点和审美态度的刺激性因素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批评没有“公认标准”，其实是不奇怪的。所有这些指责和困惑的产生，相信都是正当和合理的。他们指出的，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对如何建立当代文学专业标准和精神目标的一种接近个人化的设想和看法。

作为当代文学学科材料、文献积累的重要基础之一，当代“批评”无疑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它对“当前”创作现状、现象和作品最初、也是最生动的把握，显然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这都是无可争议的。问题在于，它是否应该与“媒体批评”严格地加以分析区分。我们应该懂得，在媒体批评年代，一切“批评”都会与媒体批评牵扯到一起，变得浑然一体。媒体批评最根本的“价值诉求”之一，是对社会大众取得一种“震撼”效果。一段明星轶事、离奇丑闻、黑幕公案、小人物悲欢，都可能成为批评的“热点”、“焦点”，被一再追踪、炒作和连续报道，直至掀起轩然大波。因此，媒体批评实际在意的是社会视听的高峰体验，但，那才是一种真正的“价值悬空”。当代作家，尤其是“当红”作家当然不可

能“与社会绝缘”。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可能就是“大众明星”。所以，当代“批评”具有两面性质，一是面对大众读者发言，另一是要对文学发言。也就是说，它难以避免地暴露出某些媒体批评的姿态、性质。但，“批评”又必须为“文学”负责，对文学的精神生活、审美生活负责。因此，批评又只能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价值”批评，是对艺术品严格、谨慎的检验和评价的工作。它不能人云亦云、说东扯西，把作家作品都当作“媒体”对象，将“刺激”效果作为批评的最终目标。

还有一种来自海外的当代“批评”，例如“鲁迅重评”、“20 世纪英雄与人的文学”、“再解读”等等。由于以“崭新理论”为依托，所以给人以新鲜刺激和耳目一新的效果，它们对有些过于固化的文学史结论的改写，确也有一定的学术分量。不过，这种“批评”的明显不足是，对历史文献的轻视，不耐烦于扎实、繁琐的基础研究。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文论批评”在海外的余脉和承传，暴露出那个时期一直未改的积习和毛病。但它以“西学”为武装的高端姿态，也令一般人士批评不得。既然有这么漫长的“暑假”，自然可以在国内学坛旅行和传经布道。但是，这一批评的“武断”口气，也时常令人吃惊。由于回避了研究的“中间过程”，以结论替代甚至遮蔽艰苦曲折研究进程的印象，同样给人触目惊讶的感觉。当然，在这些方面，我们也遇到了难题。大量的疑惑，阻塞着我们的思考：如，假如文学批评已失去了它质的规定性，完全与殖民、女性、少数民族和社会问题相混同，那么是否还需要“文学”批评？假如文学批评一定意义上变成西方“知识”的附庸、堆积，那鲜活、个人与贴近文本的感性的文学批评是否还有存在之必要？如果一切批评都与“媒体”、“西方”挂钩，那足以揭示人类困境、梦幻与抗争的文学事业，究竟能否再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大众社会？或如果相反，面对浮躁局面去作一些复杂、深入（可能并不讨好）的细致研究，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学术生存的难度？这些，都令我们感到了苦恼。

当代批评的这些状况，以及它对当代文学学科的深度侵蚀，自然与 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现状”有关。“90 年代”后的十余年中，我

们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都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一种“震惊”的现实，是它极大地动摇了我们对现实、传统、知识、精神、语言的稳定的认识。“处变不惊”的历史性沉着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对“未来”的惊恐、不安和虚无。一些人甚至正在一点点地丧失对当代文学学科精神信仰上的依赖感，对学科积累的基本耐心。当代文学错过了像现代文学那样“耐心积累”的“80年代”，像后者一样，它有足够时间清理历史，建立学科存在的根基和共同遵守的“话语谱系”。在语言学转向、解构主义、文化批评纷至沓来的十余年间，它经常随意采用各种理论、观点，提出各种问题，却没有对任何“问题”进行“沉淀”、“整合”和“转化”，并变成一种有效的属于本学科的“通用知识”。它甚至不愿意去回答，“历史”何以这样被“叙述”，中间经历了什么曲折、复杂的语言过程，并在一定的审视距离中，对其加以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在“现代文学”逐步确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话语霸权的这十余年间，充斥在“当代文学”学科中，并弥漫为一种研究者“生存环境”和“文化气候”的，不是那种“研究心态”，而是一种十分深厚的“批评心态”。在今天，“批评”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特殊存在方式、表达方式和学科的基本特征。

当然，在客观上看，在“大变”年代，我们都无权要求人人“超越”自己的时代和认识的极限。但“客观”条件却不能因此变成另一种特权，即认为本来“如此”，所以便只能“如此”。自然，对“批评”现状的学科意义的反省，对于它的改善、讨论和建议，似也不应在这一混乱的历史过程中停顿下来。

### 三

在“批评”之外，“宏观论述”是另一种运用非常普遍的当代文学研究的书写形态。“宏观论述”的作者，一般喜欢使用“20世纪”这种概括式的文章标题和概括性的描述与结论。我们有理由相信，采

取这一主观化的方式讨论问题，并求得问题的解决，肯定是因为论述者首先掌握着一种先在的、经验的思想结论。他是在对论述对象“了如指掌”的情况下从事论文写作的。但是，它也会遭遇另一个问题，即研究变成了一个“事先知道”的仪式，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对宏观论述持一种比较保留的态度，一是因为它过于自信而忽视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我们知道，出于简单化的理解，“当代”文学会被读解成一种受到社会权力压制的结果，这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研究中多是如此。从大的方面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没有问题。不过，“文学”与“政治”不同，不同就在于它是“文人”所从事的“事业”。因此，在历史过程中，它潜藏着文人的情绪、心理、历史记忆等一些为政治无法根本制服、剪灭的东西，在文人精神生活的“私密场合”，还会残留着许多人所不知的真实“细节”。例如，在《文艺报》的“编者按”与作家作品关系的起伏变化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迹象。其中原因，一是该报的编委会虽经过了数次“倒阁”、改组，但它的“主编”、“编委”等等“编者按”作者们都还保留了一定的“文人本色”，有一定的“书生气”，他们既忠诚于“党的文艺事业”，同时对作家作品也有很深的感情。另外，也非常爱才。一旦这种隐秘心态不会与大的“原则”发生根本冲突，可以适当“通融”，那么，由此产生的温和态度，就会反映到对一个“事件”，或作家作品的评价中来。其次，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也会时紧时松，不可能始终“剑拔弩张”。通过报纸的“约稿”、“审稿”过程还可以发现，文艺界因为“运动”而出现的比较紧张的关系，有时候也会缓解、松弛。在“编辑”与“作者”之间，既隔着一道意识形态的屏障，但“文坛朋友”的人伦关系偶尔也会闪现。在这种情况下，“编者按”文章的多样姿态便会“呈现”出来，令人不再感到可怕，甚至有些“亲切”的意思。如此等等，都使人们想到，宏观论述由于只注意“宏大”的命题、结论，所以，不关心这种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互文状态。当然，也就不相信凡是事物，其实都存在“限度”的问题，即使是号称强大的东西，也未必都能事事如意、所向披靡。